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王兴国/著



契接中西 哲学之主流

——牟宗三哲学思想渊源探要



QIJIETONGX
ZHEXUEZHILIU

深圳大学人文社科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王兴国/著

契合中西 哲学之主流

——牟宗三哲学思想渊源探要



QI JIE ZHONG XI
ZHE XUE ZHI ZHULIU

深圳大学人文社科文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接中西哲学之主流：牟宗三哲学思想渊源探要/王国兴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6

ISBN 7-80206-294-2

I . 契… II . 王… III . 牟宗三(1905~1995)—哲学思想—研究

IV . 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6392 号

书名：契接中西哲学之主流——牟宗三哲学思想渊源探要

作者：王兴国 著

出版人：朱 庆

责任编辑：田 苗

责任校对：祝慧敏 徐为正

封面设计：何成宝

责任印制：胡 骑 柴自邦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话：010-67078243(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址：<http://www.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装订：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690×975 毫米 1/16

字数：230 千字

印张：13.75

版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206-294-2

定价：29.00 元

《深圳大学人文社科文丛》

编 委 会

主任：章必功

副主任：吴俊忠 赵 卫

委员：胡经之 曹龙骐 苏东斌

黄卫平 陶一桃 吴予敏

景海峰 叶兴平 徐海波

沈金浩



目 录

导论—牟宗三哲学思想综论	/1
一、哲学关注着的时代与世界 /6	
(一) 上帝归寂与爱因斯坦到来的时代	/10
(二) 无体、无力、无理的世界	/18
(三) 对传统哲学精神的执持与守护	/21
(四) 上帝归寂与爱因斯坦到来的真实隐义	/22
(五) 人或人性的呼唤	/24
二、中国的去向与人类自救的出路 /27	
(一) 返本开新	/28
(二) 重建世界的人文精神	/50
三、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担负起中国哲学的时代使命 /60	
(一) 哲学地反省中国哲学	/60
(二) 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界的反省	/68
(三) 必须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	/76
四、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的思想进路 /77	



第一部 契接中西哲学之主流 /79

——牟宗三哲学思想渊源探要

引言 /81

第一章 生命与智慧的根源 /83

第一节 混沌企向的生命 /83

第二节 父教 /85

第三节 天地灵气与乡村文化的陶养 /95

第二章 逻辑启蒙与熏习西方哲学 /104

第一节 师从张申府、金岳霖、张东荪三先生学习数理

逻辑与西方哲学 /105

第二节 相契于怀特海 /108

第三章 站在西方哲学巨人的肩上 /111

第一节 本康德的批判精神消融现代

逻辑、数学、科学的成就 /112

一、兼收并蓄 博采百家 /112

二、消融与整合现当代逻辑、数学、科学 /115

三、从《数学原理》取得对逻辑独立发言的资格 /118

第二节 以康德思路消融古今哲学 /120

一、从逻辑问题进入康德哲学 /122

二、由康德直探西方哲学的大统或主流	/125
三、非专家之学的“康德学”	/135
四、旁摄诸子	/139
 第四章 复归中国哲学 继承儒学衣钵 /152	
第一节 万化之源	/152
第二节 一师一友	/157
一、熊十力对牟宗三的熏炙	/157
(一) 承接熊十力的儒学衣钵	/157
(二) 熊十力对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开启	/168
(三) 以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继承熊十力的哲学思想	/181
二、唐君毅对牟宗三的学思影响	/184
(一) 唐君毅的“带路”作用	/185
(二) 在辩证法与形上学两方面对牟宗三的启导	/186
 附录：牟宗三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201	
(一)	/201
(二)	/202
(三)	/204
(四)	/205
(五)	/206
(六)	/207
后记	/210

导 论

牟宗三哲学思想综论

咏牟宗三

道尊孔孟通陆王，法学历朱更罗康。
神游天台智者见，身在物界名士哀。
说法位居五品中，知天尽性著风流。
逆觉成圣成贤高，顺智生天生地灵。
坎陷跃起成双翼，圆教圆善本一体。
逻辑知识形上学，直觉照射无限心。
一心二门连东西，中西融合三统立。
上下贯通坎陷明，即善即真即美尽。



一个大哲学家的出现是特殊的，但绝不是偶然的。牟宗三（1909—1995），作为20世纪的一代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当代新儒学硕果仅存和最后谢世的儒学大师，在他的存在境遇和他对时代与世界的深切感受、体验中酝酿出他的哲学思想，以他独特的个性、天才和风格，哲学地建构了“牟宗三哲学”。

一个哲学家的生命创造和生命表现，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特殊的事件。然而，在哲学家的生命流动中存在着一种普遍性。如所周知，牟宗三哲学的主题在于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重建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题。面对自近代以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沉重打击，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大大地加剧了，面对自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挑激，尤其是20世纪西方哲学新潮的冲击，面对人类精神的迷失与对重估价值的期求，中国哲学既获得了“一阳来复”的生机，但也可能沉没于死亡峡谷。因此，重建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复兴的必要选择。但是，重建不是古代典籍的“注疏”、“集注”、“集解”，也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标准与模式（——无论是欧美的还是俄式的标准与模式——）来生拉活扯或生搬硬套地强行解释中国哲学，任意涂抹、打扮、臆解或歪曲甚至是阉割中国哲学，而必须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换言之，中国哲学必须现代化和世界化。从中国哲学自身在20世纪的发展来说，这表现为“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的问题。这一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去”的问题，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哲学生命的畅通象征文化生命的顺适，文化生命的顺适象征民族生命的健旺，民族生命的健旺象征民族的强大。因此，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这一主题，不是由哲学家主观地决定的，而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的一项迫切的历史使命，它既有民族性和文化性，也有时代



性和学术性，还有世界性和人类性。因此，它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

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固然是中国哲学所面临的现状使然，同时也是人类的“意义的追求”^①的表现，是消除人类精神危机的要求。人类的精神危机或“意义危机”的由来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忧患意识使中国人酝酿出古老的《易经》，狄俄尼索斯（Dionysus 酒神）精神与阿波罗（Apollo 太阳神）精神的交织与冲突给古希腊人带来了庄严的悲剧，犹太远古先民的牺牲精神陶冶出希伯莱最伟大的《圣经》，……人类的精神危机常常同人类的深重灾难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时代均有所表现，例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美俄两个超级大国持续近乎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及其中一系列的重大事件——1948年的柏林封锁，1949年苏联原子弹的爆炸（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核武器实验所引起的对放射性尘埃威胁所有生命的巨大恐惧），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1962年古巴的导弹危机，1950—1952年美国对朝鲜的战争和1964—1972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差不多50余万部队和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军力量投入战争。美国在这两次战争中的伤亡大大超过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数字）。——这些具有真正冲突的危险引起人类对大规模毁灭的普遍不安与恐惧，……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1世纪初期出现在美国的“9·11事件”，世纪末与跨世纪（1991年和2003年）的两次美伊战争，出现于中国而流行世界荼毒人类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3年）的恐怖经历，接踵而来的“禽流感”（H5N1，2003—2004年）、令人惊恐的印度洋的大海啸等等，皆使人类陷入困境乃至悲观主义之中，无不构成人类精神危机的表象。

人类自一开始，就遭受到不断的不同灾难的毁灭之害，因之对深重灾难的巨大恐惧便直接构成了人类精神危机的表象。伴随着高度发达的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到来和极大进步，出现了“知识”与“价值”，“传统”与“现代”（以后又有“现代”与“后现代”）等巨大而复杂的矛盾与冲突。此外，人类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科技竞争，军备竞赛，以及地区冲突与民族矛盾也日益扩大和加剧了。这些矛盾和冲突无不表现了人类文化理想自身的失调与

^① 参见张灏《新儒家与当代思想的危机》一文第三部分，周阳山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0年版。该文又收入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冲突，理想与实践的分离或相背，人类困陷于“理想的冲突”^①或“精神迷失”^②之中，失去了价值目标，或精神支柱，或“终极关怀”，或“安身立命”之本。“道德的人”在“不道德的社会”中能否生存下去，成为当代人无法回避而不得不直面相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③。因此，“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形上迷失”构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的特征^④。在牟宗三的笔下，人类的精神危机是由“上帝”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上帝”与“人间”的两极分离来揭示的。人类的精神危机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现代中国的思想层面。因此，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也必然要同把人类从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的目标相联系。这也是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哲学不独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中国哲学的重建必须面对人类的危机，世界的问题，为人类为世界作出她的贡献。就牟宗三来说，解救人类出精神危机，必须重建世界的人文精神。因此，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必然包含着对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对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也必然表现在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之中。

宽泛地说，胡适、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张东荪、冯友兰、贺麟等等一批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作了可贵的工作。牟宗三继其后，启秀于未振，同唐君毅等人一道，自觉地承担起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重大使命，抱着对华族与人类负责的态度，力图从哲学上为中国的去向和人类的自救寻找一条坦途，为人类生命与世界的安顿、顺畅和健旺寻觅精神与价值上的原始生命动力及其大根大本。

对牟宗三来说，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题就是牟宗三哲学的主题，顺中国哲学的发展来看，牟宗三哲学的主题也就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题。因此，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重建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躲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的哲学游戏，而是在通观古今之变，融会东西之长，学究天人之际，发皇光大人类的智慧与文化，以求成为指导社会实践的一家之言，而且它本身就是

^① 参阅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Luther J. Binkley, *Conflict of Ideals: Changing Values in Western Society*, New York :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969.) [马元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新儒家与当代思想的危机》一文第三部分。

^③ 参阅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Simon and Schuster Consumer Group, New York, 1932.) [蒋庆、王守昌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 《新儒家与当代思想的危机》一文第三部分。



人类生命上遂调适，积极行健，黾力自救的行为实践。因此，牟宗三哲学是在“古今之变，中西之争”的时代大潮中激出的绚丽多姿的一朵浪花，它关连着时代与世界的脉动，它紧系着华族与人类的命运，它通向中国文化的过去与未来，它标示着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不能归结为只是中国哲学在形式上的重建，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不仅仅是哲学形态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而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融合中外，富有中国个性，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现代哲学的规范的整合与重铸。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场伟大的变革。虽然不能说牟宗三哲学实现或完成了这一变革，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在现代的一次重大的转型与巨变，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对于推进与加深中国哲学自身的变革将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犹如一座奇妙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不完，想不尽，任由你从不同的角度或维度进行审视或研究。但是山有脉，木有本。哲学家的思想自有其运演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进路。“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要在能入乎其内而又能出乎其外，把握其思想运演的进路和内在逻辑，这不仅可见“龙象”，而且可深得“龙脉”。因此。“从逻辑思辨到哲学架构——牟宗三哲学思想的渊源与进路”构成了这一个案研究和这篇论文的主题。（限于篇幅，本书发表的是“导论”与探讨“牟宗三哲学思想的渊源”部分，至于“牟宗三哲学思想进路”部分则另作一书出版。）

为了理解牟宗三哲学的这一主题，把握牟宗三哲学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同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与哲学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必须弄清它的思想渊源及其发展的逻辑历程，就必须深入到他的存在境遇与时代感受和体验之中去，就必须深入到他的个性与风格之中去。在看到特殊性的同时，也要把握普遍性。

一、哲学关注着的时代与世界

20世纪的到来，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烈大变动的时代，“一个差异明显的、不自然的、唱反调的、自相矛盾的时代”^①，“一个正在转换

^① 李维《哲学与现代世界》(Philosophy and the Modern World) [谭振球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84年再版，第55页。

的时代，一个变化、突然而令人困惑的时代，一个肯定有更多困难、更多挑战和更多的矛盾的时代”^①，这个时代出现了种种剧烈的脱节与断裂现象“——已建立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土崩瓦解，现代人的自我与其种族历史的加速分离，在一个被认为充满暴力，而不是按着上帝意旨安排的和谐的宇宙中的个人的异化——所有这些断裂，像在地震仪上一样……”^② 已为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诗人、人文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科学家所广泛关注与论及。对牟宗三来说，这是一个文化理想失调与冲突的时代。易言之，也就是一个价值失落，意义危机的时代。

时代的病痛与症结，招致“观念的灾害”，造成世界的“无体、无力、无理”。20世纪的降临，“上帝归寂”了，“爱因斯坦的时代”到来了，人间却清一色地物化外化量化了，正如美国诗人惠特曼在其《样本的日子》(Specimen Days)里所说：这是一个“唯物质的、过于自信的、崇拜金钱的时代”。^③ 在这个时代的世界上，机器（包括电脑）越来越趋向于代替人类的活动，并且把它的（机械化的形式）模式强加于人的行为与思想，科技愈是进步与发达，人类愈是生活在由科技产品的声光色电所构成的虚假世界中，人类与世界皆丧失其本，人生与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之根久已被割断了，众生要么有如掉进瓶子里的苍蝇，在残酷的互相碰撞与挤压中盲目地挣扎着，要么成为无根的芦苇，漂浮不定，无家可归。天主教神学家泰阿德·德·沙尔丹写道：“在我们变化着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可以理解的，除非就它已经达到的目标来说。”^④ 无疑，技术时代的时代精神表现出一幅诡谲的画面，一方面是物产品与物欲的增长，人间得到纵情地享受、快乐、满足与充满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堕落、无明、危险与毁灭。技术带来的时代精神“像一个喝醉酒的机车司机，驾驶着现代化的火车，以每小时一百哩的速度在黑夜里疾驶，我们不断地通过危险信号而没有认识到我们的速度，这是由

^① 艾伦·特拉顿伯格《思想背景》，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第66页。

^② 转引自丹尼尔·霍夫曼《诗歌：现代主义之后》，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下，同上，第628页。

^③ 转引自丹尼尔·霍夫曼《诗歌：现代主义之后》，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下，同上，第659页。

^④ 转引自艾伦·特拉顿伯格《思想背景》，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同上，第66页。



我们的机械的工具造成的，只能增加我们的危险，造成毁灭性更大的碰撞。”^① 总之，时代精神的物化、量化、外在化，人的心思向外开、向下趋而只能停留在“事法界”的单向度化、或一维化的认识上，阻塞或切断了上通“理法界”（价值之源）的道路，使两极化的界限显得极为分明。这就形成了上帝与人间的两极化。

上帝与人间的两极化还表现为冷战所带来的世界的分裂与敌对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为标志，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冷战开始。无疑，冷战对世界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生活都带来了空前的巨大影响。诚如艾伦·特拉顿伯格所说：“冷战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感情现象，是政策的状态，也是思想的状态。它以某种世界图景为前提，把世界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西方阵营或‘自由世界’，以美国为首，受到美国强大军事力量的保护；东方阵营，以苏联为首，由它的‘卫星’盟国支持，即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为“代表着一个强大的侵略性的极权主义”^③ 世界，并对其采取了“遏制”政策，即以在东西方边界设置军事基地的方式进行遏制，以间谍的形式进行监视，以“集体安全”条约的形式（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作为军事准备。与此同时，“遏制”政策也指向被西方阵营视为“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因而自然包括了对“反共”政权的支持。毫无疑问，冷战的世界观对东西方阵营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均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比如，就美国来说，“一个分为‘我们’、‘自由’和民主与‘他们’、极权和‘邪恶’的世界状况，看起来无法动摇，正如人们推断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准备和警惕一样。”^④ 反之，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以及中国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是对西方阵营抑或东方阵营来说，冷战都表现出了对世界事务的某种程度的政治的、军事的与意识形态的介入。尽管随着中苏关系的瓦解，美国对这两个非资本主义

① 艾伦·特拉顿伯格《思想背景》，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第49页。

② 艾伦·特拉顿伯格《思想背景》，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同上，第4—5页。

③ 艾伦·特拉顿伯格《思想背景》，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同上，第5页。

④ 艾伦·特拉顿伯格《思想背景》，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同上，第7页。

国家所执行的缓和政策，以及后来（20世纪70年代）中美的建交，大大地削弱了在20世纪50年代居于支配地位的冷战设想的观念，然而，冷战的到来到底还是使世界陷入了敌对与分裂的状态。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低沉向下，堕落与病痛的时代通过诗人、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对人心人性发出悲情的呼唤而复苏。时代的复苏与新生必然要唤醒人的“价值意识、文化意识与历史意识”（牟宗三语），也就是要使人成为具有价值意识、文化意识与历史意识的主体，从而把“价值”与“知识”统一起来，把人文关怀与科技思想统一起来，把理想与实践统一起来。对于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诗人、人文学家、科学家与技术专家来说，人类所面临的新时代的任务，是“在新的科学与传统人文主义和宗教的价值之间寻求协调一致的基础，或者像某些情况里那样，预言如果现在的技术思想进程不加以改变，很可能就是毁灭。”^① 无疑，价值真理（道德真理）与知识真理（自然真理）——“这两种真理是否可以一起存在下去，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根本问题。”^② 哲学家、思想家必须思考与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同样，20世纪最吸引人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民主和杰出人物统治论：一些人怎样对等人类。”^③ 这一重大问题同样也需要哲学家、思想家来思考与回答。那么，从中国哲学与民族精神的立场出发，透过西方哲学而重新发现与肯定古老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基于儒家哲学为主干而融会东西方哲学的智慧的基础与支点，寻求“上帝”与“爱因斯坦”的沟通渠道，实现“价值”与“知识”、理想与实践的统一，重新找到世界与人生意义之根本，找回世界与人生的意义，——这在混沌、多元与变动的时代中代表了一种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作为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儒学大师，牟宗三自觉地充当了时代这一声音的传达者。通过对这一声音的传达，牟宗三为他的哲学思想作了一种打上了儒家标识的人文主义的历史定位。

^① 艾伦·特拉顿伯格《思想背景》，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第48页。

^② 艾伦·特拉顿伯格《思想背景》，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同上，第58页。

^③ 艾伦·特拉顿伯格《思想背景》，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同上，第27页。

(一) 上帝归寂与爱因斯坦到来的时代

为了便于理解“上帝归寂与爱因斯坦到来的时代”，及其所造成的“上帝”与“人间”的两极化，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与人文学家对于他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的感受、关注与描述。美国哲学家李维（Albert William Levi）对现代世界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20世纪……一方面是，技术上重大而美好的成就——另一方面是，急进的仇恨和法西斯恐怖主义的发生。普朗克、海森堡和爱因斯坦在自然物理方面，对秩序的系统，提出了最重要的公式化说明；但广岛的毁灭，证实了他们疯狂的结果。将近20年以前，一种混合的声音充满了我们的耳朵，一方面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情绪过度狂热而出言不逊的流露，另一方面是逻辑的罗素从容而绅士式的（上流人的）语言和审美家桑塔雅那象牙之塔的平静。汤玛斯·曼和吴尔夫写出一种常态而有启发性的散文。斯坦因和乔伊斯所写的文章作品，比较诙谐也比较接近内心的韵律。正值苦恼的、超现实主义绘画的狂想四处弥漫时，罗素和怀海德冷静而精确的《数学原理》几乎就在同时向西方文化发布。在政治、社会、哲学、文学和艺术中，我们发现一边是逻辑、理性和结构，另一边却是形式不一、热情或许甚至是神经病的写作题材。在现代世界里，这些事务怎样同时继续存留的呢？那些从何处来的呢？同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有人更深入探究这些明显的差异和所提出的反论，我相信他会发现，在经济和政治生活，哲学和科学、文学和艺术中，这些显示都是一致的，而且是相互依赖的。因为在那底下存有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极为有趣的问题——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它是20世纪第二个巨大的智力问题，也代表西方思想最后三百年的遗产。^①

1967年，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与思想家李约瑟在诺里奇的演讲中，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说道：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滥用科学的时代。日本第一个遭受到原子弹火的浩劫。当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普遍感觉到的是一种恐怖的情绪，并不因为战争将结束而感到轻松愉快（他们对欧洲人是不会这样干

^① 李维《哲学与现代世界》（Philosophy and Modern World），第55—56页。